

中古文人研究

何满子 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 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 古 文 人 风 采

**沪新登字 109 号**

**中古文人风采**

何满子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2 印张 8.625 字数 184,000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5-1394-7**

I·682 定价：4.70 元

# 序

## 绿 原

传说柏拉图欢迎哲学家进入他的“理想国”，却坚持把诗人摈之于门外。难道这位唯心主义之父早就发现，哲学家不仅善于解释世界，说不定还有本领改造一下世界？用不着到西方的故纸堆里去搜寻什么例证，不妨想象一下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竞相夸示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那番盛况，是不是跟那个“理想国”的招贤壮举有点儿相仿佛，尽管各路精英未必个个遇得上柏拉图那样开明的人主。至于诗人，唉，在那位老人家看来，竟然近乎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典型，否则他不会那样不讲情面，到两千年以后仍不免令人闻之不胜沮丧。

随便翻书，又翻到近人哈代有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伽利略当年用诗体来写他的地动说，教会也许就不会来找他的麻烦。”这句话排除了幽默成分，无异于是说，诗人在一般的世俗眼光中（不仅从教会看），正如一句俚语所说，谅他也屙不出三尺高的尿！怎么捣乱也不必认真对待似的。要说前一种态度即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态度是敌视，这一种就明明是比敌视更令人沮丧的蔑视了。

哲学家遇不上柏拉图，进不了他的“理想国”，他们又将如

之何？诗人戴不上桂冠，又不甘心流落江湖当隐逸派，又将怎样对付周围的敌视以至蔑视？都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可以姑妄言之的掌故问题，倒很是带有规律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属于历史范畴的学术问题。可是，《伟人传》的作者爱默生却说：“说到底，无所谓历史，都不过是传记而已。”这恰像是企图规避规律性的一种遁辞，反倒提醒了它的疑惑者：历史还是有的，它就存在于个别人物的传记之中。须知个人从来不仅是个别的，他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元素。把历史比作洪流，个人就是水滴，而传记显然就是拥水滴而入洪流的波涛了。那么，历史家看来要比哲学家和诗人超脱些，他正坐在历史洪流的岸边，聚精会神地欣赏晶莹、澎湃和浩渺的大小奇观……

我的朋友何满子善饮，有历史癖，常以书佐酒，喝得多也读得多，一多就少不了钻牛角尖，有时醺醺然钻得“仿佛若有光”。近年来听说他写了不少历史小品，大都以爱默生所独到的传记为题材，如《汉末清议人物剪影》、《魏晋清谈人物剪影》之类。可惜我孤陋寡闻，迄今很少看到发表他的大作的那些刊物，但对于他的研究取向却颇感兴趣。简直像知识竞赛的落榜者企望答案揭晓一样，我一直想搞清楚，东汉两次党祸究竟怎样由于“清议”而闹起来的？魏晋清谈人物的风度，虽从《世说新语》和鲁迅的文章略知一二，那到底又是些什么样的巨耐人物，当时又是怎样昙花一现地跑出了他们来？或者，至少想搞清楚，清议和清谈实质上是不是一回事？不是的话，二者又有什么关系？满子的文章照说会涉及这些深层次的因缘，可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从容读到它们。读不到它们，我却好事来为它们的汇集作序，虽不敢亦不免要说些外行话了。

靠翻事典，自不难明白，“清议”是指古时乡里或学校对于官吏的鉴定或批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清议”条如是说：“西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乍听之下，颇可为中国历史上这段廉政建设、民主传统以及知识分子之积极作用等等自豪一下，如果不知道随之而来的灭门之祸的话。至于“清谈”，现代“侃”家们说不定更熟悉一些，先是指魏晋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崇尚无为的空谈风气，蔓延开来，无非是一些存心让人想不到、听不懂的玄之又玄的所谓“阳春白雪”而已，不知怎么搞的，从汝南月旦的社会舆论领域一下子转到了谈天说地的形而上学领域。

如果不满足照本宣科，也不妨随便说说，清议和清谈从实质上来考查，不就是中国封建早期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表现的两种方式么？要说清议人物有点像没有挤进或者正准备挤进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哲学家，那么清谈人物则很可能是在写诗，甚至是在写朦胧诗，个别人也可能企图用诗体写他的“地动说”。但是，清议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而清谈家只要像阮籍那样，善于在政治上打太极拳，则又可能由于被认为“屙不出三尺高的屎”，混它一个托庇粗安。

然而，这两种下场并不因分属两个朝代而互不相干。在统一的封建历史洪流中，清谈未始不是清议的一个反动，直白说来，很可能是被后者的惨祸吓出来的。从长远来看，清谈又未必不会反过来变成清议，例如通过谈玄、写朦胧诗进行干政，据说“托词官闱”也可以包含某种深意在。不过，更多却是把清谈当作保护色，或者一种明哲保身的工具，显然已远离清议人物的那股傻劲儿。后来清谈羼进了佛教思想，进一步心平气和，四大皆空，就更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新阶段——令人想

想起已故诗人阿垇说现代派的一句话，这已是“醒着做梦，跪着造反，活着死去”了。

回溯公元二世纪，中国东汉太学生数万人争议时弊，讦发幽昧，诽讪朝政，涉及圣人，卒因缺乏今天才有的法制而遭镇压，数百人连同家族或处决、或监禁、或充军，闹了二十余年，直到黄巾起义才不得不罢休，以致成为历代读书人都不免莫名其妙而头痛的大事。个中自有迄仍扑朔迷离的复杂原因，但从远距离看去，其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又实在令西方的路德博士辈瞠乎其后。想不到一百年之后，物极必反，竟然出现了一批对国难民瘼虽说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无所作为的清谈人物。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意志消沉，作风颓废，纵酒狂醉，扪虱清谈，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方偌大一片国土遂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当然，把晋祚之亡仅归之于清谈所误也未必公正，但清谈在中国政治史上却为知识分子鲜明地标志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

更可悲的是，经过两次大折腾，中国封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不久（从隋唐起）便找到了对付知识分子的好办法，就是让天下英豪尽入我彀中的科举制的建立。不论是以帖括、八股还是别的什么试士，这个制度真算是一座精神囚笼，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禁锢到二十世纪肇端（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其间一千多年，虽说五代后梁有过所谓“清流”，宋代有过“党人碑”，明代有过“东林党”，以至清代还有金圣叹等人闹了一下子“哭庙”……而且杀的杀，关的关，同样煞是怕人，实际上从历史老人看来，都不过是小打小闹，远不及东汉“党锢”富于代表性。就整体知识分子而言，绝大多数已被驯得俯首贴耳，在盛世则凭着几句“子曰、诗云”生吞活剥地去追求功

名，到乱世则纷纷作鸟兽散以苟全性命，宁与草木同腐而“不立乎岩墙之下”——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什么“清议”、“清谈”都早已被当作山海经了。

满子果有历史癖，他在以书佐酒之余，写出了这本《中古文人风采》，我没有先读为快的幸运，不知他是怎样来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段精神创伤史或者人格滑落史的。他本人也许不过为了解酒而信笔写来，却让我们这些不懂历史的读者似乎懂得了许多。如果把他比作岸边的历史家，我想，他所面对的景色真可谓“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了。然而，历史的意义在于本身，唯物史观更强调一定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这里容不得借古讽今或者以古度今之类的主观类比。

据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是从“五四”开始的，这应当没有什么异议。又据说在今天四化大业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决不止于指手划脚，而在于埋头苦干，这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分工的细致，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早已在某个角落找到了各自安身立命的位置，不像古代的同行除了做官，即挤进柏拉图的“理想国”，就觉得别无出路。何况柏拉图的那一套也不过是作为讲义在他的学园里念念而已，连他自己也未必真正相信，更谈不上去实现它。知识分子毕竟应当从自己身上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才不愧于他所自命的现代性。

至于哈代所说的教会，它也不得不跟着现代化起来，“现代主义”一词就是它首先用起来的，因此有悖《圣经》的“地动说”之类，或者即使用诗体来写，怕也脱不了干系，或者根本就无所谓，它可能已经从《创世纪》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地动说”

的依据：——几年前听说，它已经公开为伽利略平反了，看来事态在向后一种令人乐观的方向发展。然而，今天的诗人不论中外，其被敌视以至蔑视的氛围毕竟日渐淡化，倒不是社会忽然换了胃口，开始钟爱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起来，恰巧相反，他们已被冷落到不得不把人和作品一起投入商品机制中去，否则无法生存——这又是新的规律，大概还不属于满子准备钻牛角尖的范围。

1991年8月19日

# 目 录

序 ..... 绿原 ... 1

## 第一品 汉末清议人物剪影

序论	3
李固生涯的三个回合和汉末名士婞直之风的滋长	7
李固与太学诸生	11
陈蕃的性格	14
陈蕃之死	17
李膺与党锢案第一阶段	20
第二次党锢案与李膺之死	23
大灾难及杜密的自杀	27
范滂的人品	30
范滂的慷慨赴死与岑晊的狼狈逃窜	34
郭泰现象	37
郭泰的交游	40
名士中“纯儒”的一翼	43
名士薰莸	46
张俭事件和名士的义侠之风	49
许劭的知人和范冉的孤介	52
清议的句号人物孔融	56

跋	60
---	----

## 第二品 魏晋清谈人物剪影

小引开宗	67
何晏与奥迭普斯情结	71
何晏的学问、清谈和服药	74
第一个清谈名士之死	77
早夭的天才王弼，顺便谈早夭的多情种子荀粲	81
王弼的身世和学术成就	84
夏侯玄的风骨	87
夏侯玄以名重致患	90
嵇康必死之道	94
嵇康之死结束了正始之风	98
嵇康的才高与“识寡”	102
阮籍在两性关系上的风采	105
阮籍的悲剧深度	109
清谈名士世家的阮氏诸人物	113
向秀——嵇康的密友和配角	117
刘伶的著作是喝酒	120
披着老庄外衣的名士山涛	124
王戎“俗物”，偏恋清誉	128
新一代清谈的格调及宗主王衍	131
王衍的“清高”及其他	135
王衍的姿容和品题人物之谬	139
乐广的清谈路数	143
乐广“名教”的言与行	147

清谈皇帝	151
简文帝的“远体”	155
清谈和尚支遁	159
支遁的清谈胜于佛经义解	164
不争气的清谈名士殷浩	169
谢安的鼻子	174
谢安与王导的区别	178
谢安超人的镇定	183
清谈之家的主心骨和谢安的体任自然	187
附：谢道韫	192

### 附品 书影追形杂笺

解题	207
千古一大谜	209
杨子思想钩沉及其湮灭的必然命运	211
直不疑的品行与时尚	213
圯上进履的翻版	215
中国最早的相思病例医案	217
儒的两面：儒学以巧宦兴	219
儒的两面：儒学以理想主义绌	221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过渡人物	223
孔融案株连二子的不同记载	225
刘备不从刘表手中取荆州探微	227
曹操与杨修	229
曹操的好色和曹魏闺风	231
西晋两皇后丑事与名教的沦落	233

道教拉隔壁亲眷认宗老子	235
老庄不同	237
两个最懂儒学精髓的皇帝(上)	239
两个最懂儒学精髓的皇帝(下)	241
儒家的道，素王与真王	243
孔子升格为第一把手	245
三教鼎立始于唐	247
唾面自干与自唾其面	250
两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儒	253
我诅咒	256
后语	259
辑集后记	261

# 第一品

汉末清议人物剪影



## 序　　论

汉末名士清议以及随之而爆发的党锢之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变局。它作为腐朽的东汉王朝的送葬曲，政治上的意义固然不小；一批理想主义的儒士——儒家学派积极的一翼——在和宫廷权宦的交锋中互通声气，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这现象更为前所未有。这批儒士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代表，他们在依附王权而又和王权斗争中认识了自身的力量；虽然这斗争没多久就告失败，善类摧折殆尽，但却为后代许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正直儒士提供了风骨上的楷模，也给全社会留下了一个明确的舆论共识：士气代表着民气。封建社会“士为四民之首”的意识虽早已形成，但至此才牢固地确立。以后掌握政权的人都认清了得民心必须先得士心的道理，即使为了改善形象，也得这样办。唐太宗欣欣然有喜色地说“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矣”，就是统治者这一认识的最好表白。

“士”的最早概念是一群非农非工非商的浮游于社会的成员，与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概念直到汉朝以后才确立；这事曾使本世纪北洋军阀时期旧文化阵营中的“一支笔”，著名的章士钊出过洋相，他把“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这是经过鲁迅杂文而为大家所熟知的今典。宗法世袭制渐趋瓦解的战国时期，中国最早和政治势力结合而且最出

风头的士，是游说诸侯的策士，那时周孔儒士还只是高谈迂阔之论的准理想主义者，实在称不上“圣之时者也”。先秦至汉初的策士，纵横家、法家之流，都还是各干各的独立活动的个体，而且常常因各自的利益互拆墙脚，其他百家争鸣的各派也只是鸣一鸣而已，尚未成为行动的力量。西汉似乎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的是侠士，侠士虽是“已诺必诚，不爱其躯”，颇近乎“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之徒，而且“声施于天下”，“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史记·游侠列传》）；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君卿）还为“五侯”的上客，备受信用（见《汉书·游侠传》），拥有颇大的潜势力，但都是靠个人的姿质，仗义修名而得，又没有学说、理论作轨范，兔起鹘落一阵，人亡事息，对民族文化关系不大。此后，则侠士或演变为权门的爪牙，或化而为替天行道的强盗，下焉者便沦为黑社会的人物，成为杜月笙、张啸林之徒了。

儒士从叔孙通给汉高祖定礼起，以个人身份与政权结合，至汉武帝崇重儒学，逐渐培养起有分量然而仍然是散在的政治力量，大抵只在门生故吏、通家世好之间有所联系，构成大小集团，通常表现为一种门族势力，并未由于文化上的共识，即共同的价值观而凝聚，而蔚为一种有共同语言又足以影响舆论的势力。

群体的形成及其觉醒，必须以共同的人生理想为支柱，否则无所谓觉醒，要有也只是以实务利益为枢轴的聚散，即使不是相助匿非，也缺乏悲壮的意义；觉醒，又是社会力量冲激挤压的结果。无外侮，民族意识是沉睡着的；无斗争，阶级意识也无从觉醒。儒学思想有实利主义的一面，就是从政治权力那里分一杯羹，帮忙帮闲以获得显亲扬名，安富尊荣；又有理